

“中国工农红军滇游击队”印盒

□尹 仑 任传振

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历史博物馆，有一枚正面刻有“中国工农红军滇游击队”的印盒，那10个红漆文字虽已斑驳，但蕴含着一段珍贵的红军故事。这是一个铜镀铬的印盒，长10厘米，宽4.5厘米，高2厘米，做工精致，虽然随着岁月的流逝已经出现处处斑驳，但在光线的照耀下整体还闪烁着银光。如今印盒中的印章早已不知所终，如果不是印盒正面上还保留有10个红漆文字的话，这个印盒也不会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查阅红军在云南的历史，在目前的史料记载中曾经有两支带有“滇”字番号的红军游击队活跃在云岭高原，一个是“中国工农红军滇黔桂边区革命游击队”，另一个是“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

“中国工农红军滇黔桂边区革命游击队”是1929年12月邓小平、张云逸等在广西组织发动百色起义后，在广西右江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的红七军二十一师派人到云南省富宁地区发动组织起来的。中国工农红军滇黔桂边区革命游击队创建的滇黔桂边区革命根据地位于云南、贵州、广西三省交界处，是红七军主力北上后，在南方坚持开展游击战争的重要根据地之一，也是党在云南少数民族聚居区建立的第一块红色根据地。1930年6月，红七军主力北上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韦拔群、陈洪涛、黄明春奉命返回右江筹建红二十一师，在右江坚持革命斗争。

1931年8月，中共右江特委决定进行战略转移，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到外线作战。1931年11月，右江特委派黄庆金、李德惠率领部分红军到滇桂边活动。1932年底，韦拔群、陈洪涛相继牺牲，右江革命根据地遭到严重损失后，右江下游党组织又陆续派六十二团干部和地方主要骨干进入滇桂边区工作，组建了600多人的游击队。1933年五六月，中共右江下游党组织又派一批干部进入滇桂边区协助工作。至1934年初，滇黔桂边区的武装斗争已由中心区的富宁发展到广



西的靖西、那坡、德保、西林、百色等县的部分地区。1935年后发展到广南、麻栗坡。仅富宁就建立劳农会21个，赤卫队27个，赤卫队人数达2600多人。与此同时，各级政权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形成了全区的革命武装斗争，建立了以富宁为中心的滇黔桂边区游击根据地。

滇黔桂边区革命游击队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历经近8年的艰苦战斗，鼎盛时期，游击队和赤卫队发展到8000多人枪，根据地面积达滇黔桂的28个县4万多平方公里，人口180多万人，英勇抗击了滇黔桂三省反动武装10余次“围剿”。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与国民党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滇黔桂边区革命游击队的主力接受改编北上抗日。部分红军干部战士根据中共广西工委“右江今后党的工作是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指示，转移到中越边境地区继续开展隐蔽斗争，一直坚持到1949年富宁解放。滇黔桂边区革命游击队使红七军播下的革命种子发芽、长大、开花结果，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则与长征有关。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立即调整战略方针，改变行军线路，一渡赤水，向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素有“鸡

鸣三省”之称的云南省威信县扎西地域集结。1935年2月5日至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扎西会议，做出事关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和战术部署，其中包括在川滇黔边区创建新苏区根据地，成立中共川南特委和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川滇黔边界地区开展游击斗争。周恩来亲自参加红军纵队动员会，并明确游击纵队的任务：一是打击、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二是安置和保护好伤病员；三是建立根据地。2月12日，留下组建游击队的红军指战员与红军主力分手之后，组建成立了红军川南游击纵队。7月上旬，中央红军北上后，红军川南游击队与黔北游击队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活动于川滇黔边区。

游击纵队在三省边区积极开展英勇的武装斗争，主动寻敌作战，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积极向川南游击。国民党军队以为还有一支红军主力留在川南，十分惊慌，急调川军以大量兵力，对纵队进行堵截。蒋介石更深恐红军纵队在川滇黔三省边区立足，创建根据地，亲自调集云贵川大量兵力对纵队发动多次三省“会剿”。面对数倍、数十倍的国民党军队和民团的跟踪堵击，纵队英勇战斗，迂回穿插，进占扎西、包围长宁县城，奔袭川南重镇安宁桥、梅洞场

等20余个乡镇，攻取四川筠连、贵州赫章县城，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威胁泸州、宜宾、毕节等要地，这样，纵队在三省边区拖住大量敌人，策应和配合了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和红二、六军团的转移。1936年9月，游击纵队为了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把在云南威信一带组织起来的农民武装扩建改编，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云南游击支队”。

1936年秋，川滇黔三省国民党军队集中重兵对红军游击纵队进行了连续3个月的大规模“会剿”，游击纵队奋勇战斗，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到同年底不幸失利。虽然游击纵队主力失败，但以云南支队为代表的红军游击支队一直坚持斗争到1947年。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是中央红军长征中播在川滇黔边区的革命种子，游击纵队在川滇黔边区20多个县境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牵制了近10万敌人，有力地配合了红军主力长征，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光荣任务，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目前，除了上述两个番号中正式带着“滇”字的红军游击队以外，还没有发现“中国工农红军滇游击队”的记载，那么这个印盒上的“中国工农红军滇游击队”番号是不是蕴含着一段尚未被人发现的红军历史、等待党史研究者进一步挖掘？抑或上述两个已为人知的红军游击队在特定时期的称谓呢？但无论如何，这个印盒上的“中国工农红军滇游击队”都记录了红军主力部队长征过云南以及红军游击队在云南的光荣历史，这个印盒本身也成为了一个见证历史的珍贵红色文物。



谭冠三，湖南耒阳人，开国中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工干部的杰出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作为十八军的政委与军长张国华一起率部进军西藏，完成和平解放西藏任务，并为西藏的进步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投身革命，磨砺成长

谭冠三少年时期，结识了一些进步青年，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籍，萌发了救国拯民的思想。1926年，谭冠三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耒阳县第二区党团书记兼区赤卫队党代表，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8年，谭冠三参加了湘南起义，之后带领100余人的赤卫队上了井冈山，任红四军军需处文书。毛泽东称赞谭冠三是为革命“入了股”的功臣。谭冠三先后参加了开辟赣南闽西中央苏区斗争、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谭冠三率部在冀鲁豫边区开展游击战。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参加了邯郸、鲁西南、淮海等战役，并于1949年任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政治委员，参加了渡江战役、衡宝战役和西南战役。

长征路上，在大凉山彝民区的一段经历充分体现了谭冠三的政工才能。当时谭冠三在行军途中主动了解彝民风俗，并对同志们进行了严格的民族政策教育，要求战士对彝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绝不动武”。之后，谭冠三部在谷麻子一带突然遇到几千彝民拦路，装备被他们抢了个精光，甚至战士的衣服都被扒走，但同志们坚决没有还击。毛泽东说：我们的红军战士们演出了与彝民赤诚相见的好戏！后来，刘伯承司令员与彝民首领讲解了红军民族政策，并与之歃血结盟，拜为兄弟，实现了汉彝民族的团结。红军再次路过时，彝民便夹道欢送，之前夺走的东西，也如数归还。

挺进西藏，不辱使命

新中国成立后，解放西藏提上了议事日程。毛泽东于1950年1月2日从莫斯科致电党中央，进一步说明解放西藏的重要性，确定由西南局担负进军和经营西藏的主要任务。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和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经过反复研究和慎重考虑，决定派遣军政兼优的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委谭冠三率部解放西藏。对于身经百战的十八军而言，解放西藏在军事上完全没有问题，但这支劲旅此时驻守川南，很多指战员都想在山清水秀、气候温和的鱼米之乡安家落户，然而一转眼全军就要开赴数千里外条件艰苦的西藏高原，大家的思想都产生了很大的波动。为此，谭冠三狠抓由“安家川南”到进军西藏的思想弯子，并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年龄大、身体弱及家庭确实有困难的予以合情合理的照顾；对基本条件具备但思想认识不到位的予以耐心开导——不要认为西藏是不毛之地，那可是帝国主义垂涎的地方；对贪图享受不愿进藏的则予以严厉批评或纪律处分。同时，谭冠三舍小家、顾大家，继续把4个孩子放在河北农村。正是他这种无私的精神，激励感染了全军将士，大家义无反顾地向着进军西藏、解放西藏的道路前进。他们风餐露宿，翻过一座座连绵的大雪山，渡过无数条季节性河流，涉过数十条寒冷刺骨的冰河，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1950年10月，在张国华、谭冠三的指挥下，十八军发起了解放中国大陆的最后一役——昌都战役。在解放军强大攻势下，西藏的旧军队被打得溃不成军，此役共歼敌5700余人，计有5个代本（编者注：“代本”为藏语，清代乾隆年间设立正规藏军，始设代本一职。民国时期，西藏地方政府扩军，而代本统兵建制，相当于一个团）全部、3个代本大部。昌都战役的胜利，不仅沉重打击了西藏上层反动势力，而且打开了解放军进军西藏的门户，也为和平解放西藏铺平了道路。在进藏的日日夜夜，谭冠三担负政治工作和补给工作，他反复深入地对各级指战员进行系统的民族政策教育，还带头学藏语、抓糌粑，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将士们严格执行民族团结政策，部队在行军途中一律不住民房、不进寺庙，而且坚决不取群众一粒粮食、一头牛羊。这样，解放军爱护人民的政治影响不胫而走，尚未解放的洛隆、丁青、波密等地的土司、头人也纷纷派代表前来欢迎解放军进驻，有力实现

谭冠三中将：一腔热血洒高原

□王玉珍

了进藏前预设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标。

经略高原，青山埋骨

解放军进藏之初，因公路尚未修通，内地物资供应不上，导致驻藏部队严重缺粮。为此，十八军提出了“开荒生产，自力更生，站住脚跟，建设西藏，保卫边防”的口号，并成立了以谭冠三为主任的生产委员会。1952年8月，谭冠三创办了西藏军区第一个农场——“八一农场”，并经常到农场和干部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经过一年的努力，“八一农场”的庄稼获得了大丰收，谭冠三特意邀请西藏各界人士到“八一农场”参观，当他们看到这昔日的荒滩结出累累硕果，都竖起大拇指称赞“金珠玛米”（编者注：藏语“解放军”）了不起。谭冠三常常对战士们说：咱们在世界屋脊、风雪山高原生产，撒下的不仅是萝卜种子、白菜种子，而且是希望的种子、团结的种子、富裕繁荣的种子啊！在生产委员会的部署下，昌都、江孜、日喀则以及阿里地区的部队都纷纷组织开荒生产，并获得了较好的收成，进而为站稳脚跟奠定了物质基础，极大地鼓舞了驻藏部队长期建设边疆的勇气和信心。

同时，根据党中央的对藏工作方针，西藏进行了彻底废除封建农奴制度的民主改革运动，对爱国农奴主的土地也实行了赎买政策，即由政府出资购买农奴主土地分给农奴。这其中有关农奴主不愿接受赎买金，谭冠三则真诚地劝他们收下，这样既让农奴分得了土地，又维护了开明人士的利益，增进了民族团结。在民主改革期间，谭冠三十分注重实地调查，和同志们一起研究制定了符合西藏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有效推动了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实现了人心稳定、经济发展和生活改善。1985年12月6日，在西藏这片热土立下赫赫功勋的谭冠三与世长辞。弥留之际，他向党提出了惟一的请求：“我死之后，请把我的骨灰埋在西藏。”根据谭冠三的遗愿，西藏自治区的干部军民怀着深厚的感情，在拉萨“八一农场”苹果园隆重举行了谭冠三骨灰安放仪式。



聚力五个方向推动军队高质量发展

□印言曩

回顾历史，我军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一直奋斗在向质量要战斗力的征途上。进入新时代，习主席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标定了人民军队作为大国军队、强国军队的样子，高质量发展成为强军征程上日益鲜明的时代符号。只有积极适应世界军事发展趋势和我军战略能力发展需求，始终以加快先进战斗力有效供给为指向，以高质量武器装备、高素质军事人才、新型作战力量为重点，才能不断推动军队现代化由“量”的增值转向“质”的跃升，在奋进一流的质高量发展之路上开启“加速跑”。

聚力“应急应战”的科学发展。习主席强调，“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重大任务战建备统筹”。过去讲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是养兵千日、用兵千日，部队天天都在执行任务，呈现出练兵用兵一体化、兵力运用常态化的特征。特别是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安全形势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大，军事斗争任务艰巨繁重，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已经成为“十四五”乃至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的突出特点。适应国家安全形势新变化，我军使命任务不断拓展，斗争、备战、建设之间没有换挡期，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来运筹，突出战的牵引、提高建的效能、强化备的支撑，形成战建备一体推进的良好局面。推动军队高质量发展，就要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针对可能出现

的各种复杂困难情况，预作压力测试，预储战争潜力，预备多种后手，确保应急应战有能力、完成任务有保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锚定“投向投量”的精准发展。习主席强调，“要坚持作战需求的根本牵引”。这离不开合理确定投向投量，提高资源配置精准度和集中度。军事项目的花费历来是很大的，如果作战需求搞不准，投下去了，不仅会影响战斗力建设，而且会造成巨大浪费。现在，我军资产体量很大，但性价比不高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只有紧紧围绕“谁来用、用在哪、用多少、怎么用”，真正把作战需求分析透了，从而把资源的投向投量搞精准了，军队建设才可能步入正确发展的轨道。推动军队高质量发展，就要针对作战需求对规划牵引不够有力、预算同计划衔接不够紧密的问题，加重财力物力集中统管力度，加强管钱管物制度设计，加大重要资源统筹调配份额，把资源投向向量同军事战略布局和建设发展布局更好衔接起来，切实提高资源配置的精准度和集中度，确保国防资源向战斗力建设聚焦、向军事斗争准备急需用力、向保障官兵物质生活倾斜。

突出“新城新质”的体系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增加新城新质作战力量比重。新城新质作战能力历来代表着军事技术和作战方式的

发展趋势，往往是一个时代军事发展的“风向标”、战斗力新的“增长极”，谁能在新域新质作战力量发展上领先一步，谁就能赢得未来战争制胜先机。现在，世界新军事革命迅猛发展，以人工智能、生物交叉、网络信息、微纳米、激光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发展很快，正在引发战争形态向智能化战争转变。可以说，发展新城新质作战能力，关乎国家战略安全全局，影响和决定军队未来。推动军队高质量发展，就要把握新质战斗力建设特点规律，紧盯新型领域安全搞好战略预置，成体系推进相关战略能力和新城新质作战能力建设，在一些战略必争领域形成自身独特优势，打造与一体化联合作战相适应的新质战斗力，从而更好适应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需要。

坚持“自立自强”的超越发展。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面对一些国家不断升级的遏制和防范，必须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把科技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提升我国发展独立性、自主性、安全性。国防科技创新具有更强的对抗性，依靠别人、依附于人必然受制于人。我们没有别的路，只有坚持自主创新，把军队发展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推进军队建设高质量发展，要求我们必须聚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快实施

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重大工程，创新先进技术向战斗力转化的模式，优化国防科技创新环境，缩短战斗力生成周期，切实让先进科学技术尽快转化为现实战斗力。

基于“效能效益”的创新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提高军事系统运行效能和国防资源使用效益”，首次提出“全面加强军事治理”这个重大命题，为我们如何在军事系统运行日益复杂情况下提高发展效能提供了方向引领。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军事革命迅猛发展，我军建设正处在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对提高军事系统运行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迫切需要加大军事治理工作力度，构建现代军事治理体系，以军事治理新加强助推强军事事业新发展。推动军队高质量发展，就要把握新体制下军事系统运行特点要求，坚持全局统筹、系统抓建、体系治理，加强各领域治理、全链路治理、各层级治理，完善“需求—规划—预算—执行—评估”的战略管理链路，构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评估体系、监管体系，推进新时代强军事事业行稳致远。

